



劳动分工、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贾根良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贾根良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贾根良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宝坻四印刷厂印刷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11千

印数: 1-1000

ISBN 7-310-01241-0

F.250 定价: 12.00元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系辞传·上篇

在民主国家里，关于联合的科学是科学之母；所有其余的进步都取决于它取得的进步。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40)

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分工为媒介、制度变迁为核心、累积因果、自我演进的非均衡过程。

作者论文手记

1002/01

南开博士丛书

出版前言

推荐英才,促进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宗旨。

南开大学是国家教委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这里,学科全面,人才荟萃。全校设有 22 个系,55 个专业,18 个研究所,硕士学位授予学科 76 个,博士学位授予学科 35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11 个,每年培养出众多的各级各学科的专业人才。

“南开博士丛书”汇集了从历年各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遴选出来的佼佼者,探讨的大都是各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作为科研成果,具有资料翔实、方法科学、立论有开拓性的特点。这些论文都是在老一辈专家、导师指导下,作者潜心研究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它们不仅反映了学科的发展现状,而且展示了学科的发展趋势。通过这些成果,我们看到了青年学者的成长和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光辉前景。

作为国家教委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的出版社,我们有责任组织出版“南开博士丛书”,以便在推荐英才、繁荣科学和教育事业方面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

本丛书的作者以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博士生为主,也包括曾在南开读书、由其他学府授予博士学位的博士生。

我们竭诚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体现上述全社同仁的初衷。

南开大学出版社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一个作者的写作和研究首先与个人的经验有关。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劳动分工、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探讨。问题的提出,是作者对现实世界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结果。20 世纪下半叶,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这种变化的历史过程不仅给作者以启迪,本书主题即源于此,而且历史发展对作者最初思考的检验和证明,使作者对该主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和热情^①。然而,就个人经验来说,作者对中国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则有更深的体验。作为一个学生,然后作为一名教师,每个假期我都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80 年代中期,我所感受到的只是农村的生活水平一天天在提高。直到 1992 年暑期,我才忽然发现,与 10 年前相比,村民们的

^① 参看贾根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1989 年 6 月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硕士论文打印稿。

衣服鞋子已经完全不用自己缝制了,农民最大的投资——住房建设不再是采取助工形式,而是交给专业建筑队来承包,养鸡、养牛专业户的出现以及采用科学的现代化饲养方法等等,已使旧时的农村面貌不再能辨认出来了。短短的10多年,中国农村的专业化经济已迈出了有史以来巨大的进步。这种伟大的进步无论怎样估计也不过分,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不会忘记,亚当·斯密是怎样开始他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专业化已成为中国农村无休止变化的新起点。

法国有句古话,“过细观察,方得真知”。蓦然回首,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感到自己忽略了身旁最重要的事实。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就业人口不断减少,农村专业化经济出现的背后,可能隐藏着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而这些原理几乎被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虽然我们承认劳动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但却不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中国农民自春秋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没有积累下什么资产。尽管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为勤劳刻苦的民族,但时至1978年,中国农民仍不能免于贫困。然而在短短的十年间却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进步,这与肇始于1978年的农业生产制度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改革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作者家乡腓纶、羊毛纺织业的发展史,提供了改革推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一个历史缩影。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民们开始进入完全陌生的、过去在当地农村根本不存在的腓纶纺织业。成千上万足不出县的农民肩扛手提,为推销商品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各个角落,这使我对英国发展经济学家P·T·鲍尔的著名论断深信不疑,“在欠发达国家,对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自我奋斗的渴望以及富于冒险精神并不是企业家特有的品质，成千上万的极端贫困、没有土地的农村居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惜迁移几千英里”^①，经济发展“既不是由于政治上的独立或对本地居民反复灌输具有民族特点的制度，也不是用经济发展的抽象口号激发民众的高昂热情，或其它任何形式上的政治或文化上的革命所导致的结果。……实际的情况是：机会的出现与增多，大都来自与外部的广泛接触，并主要通过以市场为主的各种信息渠道，促使人们做出自发反应。经济发展是在一个坚定但干预有限的政府领导下取得的……”。^② 竞争和市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成为经济发展强大的推动力。

然而，更使我惊叹不已的是，这种纺织业的发展过程重现了从家庭生产到工厂制的演变过程，以及市场所提供的动力。除了鲍尔爵士笔下的工人和农民懂得市场上所必须的价格之外，在这里农民们还懂得联合的科学和艺术，懂得如何通过组成企业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实现由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巨大收益。“太阳底下无罕事”，通过对中国农村发展巨大成就和目前农业危机的考察，我们不得不承认，1978年以来我们所取得的全部进步，似乎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

二、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中国农村伟大的历史变迁具有普遍的理论 and 现实意义。然而当你深入研究理论经济学，以期对此提出解释时，就会发现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在这种巨大的变革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它并不能

①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 页。

② 《经济发展理论的十位大师》，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 页。

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虽然劳动分工和制度安排的演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它是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导演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悲壮历史剧的主角,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除了其集大成者 A·马歇尔之外,余者却几乎连个影子也见不到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劳动分工受到了公理般的礼遇,经济学家们对斯密定理给予了极高的地位,无不承认分工是生产率增进的源泉,然而却将其束之高阁,在经济分析中排除出去了。因此,不仅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得不到解释,而且理论上的偏差对现实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如 O·兰格模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家的思想,^① 这反映了科学对现实的傲慢与偏见,其结果是造成了 60 年代以来现代经济理论持久的危机。^②

这种危机在战后初期发展经济学曾繁荣一时的命运中可以窥见一斑。发展经济学这门试图解释从欠发达经济向现代经济这种历史性过渡机制的分支学科,虽然清楚地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解欠发达问题上所存在的局限性,特别是标准的瓦尔拉斯分析,它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完全信息、可忽略的外部性以及制度不变等等,在解释欠发达经济时所存在的不适应,力图摆脱主流经济学的俗套,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并走到了这一进程的边缘,^③ 但却未能深入下去,而与其初衷相违背,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却集中于发展战略、经济计划和政策建议,忽视了对产业结构变革机制和制度变迁的探讨,结果是仍不能摆脱其悲

① 参看贾根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第 57—59 页。

② 参阅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但该书未能反映出危机的全貌。

③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罗森斯坦—罗丹对外部性和规模报酬递增有深刻的理解,但他们却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得出政府投资活动的“大推动”理论。缪尔达尔和罗斯托是另外两位代表人物。还可参看普雷纳伯·巴丹:《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译文》1994 年第 1 期。

惨的命运，七八十年代传统发展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家们嘲笑的对象。虽然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但不能否认，战后初期曾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尊贵客人的发展经济学家，如今却成了流浪的乞丐。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可以追溯到边际革命时代，从19世纪末以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开始形成两个分支：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某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然而在19世纪末的经济学革命中，主流经济学摒弃了这一传统，正如A·刘易斯指出的：“19世纪的经济学家经常提到土地租佃、长子继承制或联合股份公司的立法。但是，在20世纪第2个25年间，这种兴趣不再时髦了，甚至还有人权威地宣称，这不是经济学家的事”。^①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也并未把劳动分工作为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的核心思想。针对劳动分工及其包含的制度安排涵义越来越被忽视，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llyn Young)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中强调指出：“我认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② 然而，即使是在阿林·杨格发表了这篇精辟的文章之后，经济学界长时期内对此仍保持沉默。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阿林·杨格在论文中指出的，“我确实很怀疑，经济学家们现有的工具……可能妨碍他们清楚地

①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② A·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Vol. XXXVIII (1928), P. 529.

认识报酬递增现象的较一般或较基本的方面。”^① 因为随着经济学日益向数学精密化方向发展,处理劳动分工所需要的数学方法如库恩—塔克尔定理尚未被人们所了解,而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定型之时,马歇尔用一个假定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假定一个社会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纯消费者,另一部分人是纯生产者,生产与消费的决策分开进行,这个假定就使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制度安排问题转到了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制度不变和完全信息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是一个隐含的假定,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家庭、市场和企业等种种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学家都不能回答。在纯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分工也是给定时,我们就无法知道这种完全商业化的社会是怎样从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演进而来,^② 因而,欠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的历史性过渡过程,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了。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发展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中,无法容纳报酬递增活动,因为每一个报酬递增状态都意味着不均衡,当这种不均衡出现时,就存在通过资源重新配置以取得收益的机会,这种机会的获取取决于制度安排为人们所提供的经济刺激,所以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探讨是以制度变化所产生的经济条件变化为基础的。^③ 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与增长理论,一点也未抓住这类核心问题,它把资本视做生产货物,技术和制度则是外生变量,新产品和新工艺引起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主导部门重

① A·Young,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Vol. XXXVIII (1928), P. 527.

② 杨小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0页。

③ 舒尔茨:《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要性的变化,以及经济组织方式和性质的变化,在模型中都消失了,新古典经济学所分析的经济是没有时间方向的世界,所以,它根本就不能揭示出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过程的规律。

变化的开端起因于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对新古典范式的修正。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发表了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这篇论文关心的问题是,既然专业化的生产者可以通过市场组织劳动分工生产专业化产品,为什么还需要企业组织这种制度上的安排呢?正像孟德尔关于遗传学定律的论文,在他死后多年才由三位青年生物学家同时发现一样,科斯这篇万把字的论文发表后,长时间内默默无闻,只是到了60年代初,才因其成名之作《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连科斯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然而,科斯是很幸运的,1987年芝加哥大学为这篇论文举办了发表50周年、《国富论》出版211周年的纪念活动,把这篇论文提到了与《国富论》同等重要的地位,科斯也于199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因此而感慨万端,他写道,80岁高龄因20岁时的一篇论文而获奖,这真是一种奇特的经历。^① 罗纳德·科斯等人所发起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其意义已超出了经济学范围,对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制度经济学运动的影响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开始放宽某些假定,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正统的瓦尔拉斯经济学支柱已失去效力,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是经济学在制度不变条件之下的一个特殊理论。实际上,制度处于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科斯指出的,“讨论交换过程,却不指明交易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对于经济学家而言,这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② 新制度经济学在

① 罗纳德·哈里·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第58页。

② 同上文,第60页。

交易费用概念之上,一是运用边际分析等方法对交易费用进行分析和度量,二是运用交易费用和产权作为分析的工具,分析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价格制度和组织制度,这些都是围绕资源配置展开的。实际上,制度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而且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制度本身也是生产要素,是人类社会生产和交换中最稀缺的资源。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场运动,使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大大拓展了,对新古典范式的这种修正,正像爱因斯坦相对论对牛顿理论的革命一样,可以看作是经济学世界从绝对时空走向了相对时空。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性质是有限的。按照拉卡托斯(1970)的理论,科学研究的纲领是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它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所构成。保护带的调整只是对研究纲领的修正,而硬核的改变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形成。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及其制度约束,修正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但作为新古典主义硬核的理性最大化和均衡分析结构仍被保留下来了。由于这种内在的缺陷,新制度经济学在经历了一段研究高潮之后,现在已经呈现出报酬递减之趋势。新制度经济学要想保住已有成果,并取得更大的进展,它就必须对其理论结构的硬核进行根本性改造。

科学革命的规律展示了科学进步中必要的张力及其非直线发展的特征。当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对旧制度学派嗤之以鼻时,我们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旧制度学派为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借鉴。思拉特·埃格特森认为,赫伯特·西蒙在“有限理性”概念之上所提出的满意模型,代表着对新古典研究纲领硬核的抛弃。^①尼尔森和温特又在此基础上,试图发展一种进

^① Eggertsson, T.,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

化的理论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论纲要,这两位作者关于企业惯例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对旧制度学派理论价值的认识。导致我们对旧制度学派重新认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的诺思(Douglass C. North)近来表现出对新古典硬核的强烈不满,他对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正是旧制度理论硬核中的“玄念”。当然,旧制度学派理论结构的粗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必须对硬核的要素进行重组,从而使“玄念”发展成一种可程式化的概念体系。在这方面,目前正在兴起的复杂性科学与旧制度学派有许多契合之处,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对报酬递增的新近研究代表着在复杂性经济学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他试图把理论结构建立在进化范式之上。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勃仑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种进化的科学?”由于时代的局限,旧制度学派不可能孕育重大的理论创新。然而,今非昔比,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学领域里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① 吸收现代自然科学本世纪初以来突破性革命进展的成果,是制度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基础,它将取得的成就定会像爱因斯坦之后的量子力学、耗散结构理论等一样,成为又一革命性进展。目前制度经济学进化之范式正处于概念规范化的早期阶段,如果它能提出一种“新生代”的理论结构,那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的一场真正的革命,从而将为本书的主题——分工及其制度结构提供许多令人惊奇的结论。但这样一项历史任务是任何个人力所不逮的。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者力图以此为指导,吸收新旧制度学

^① 华勒斯坦等:《开放的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8页。

派已有的成果,运用于对分工及其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如前所述,劳动分工在论文中是作为核心概念出现的,这与我
从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劳动分工的富于洞察力的思想中得到的启发
是分不开的。实际上,在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经济学大部分研究领域
之时,对劳动分工的研究,仍有偶偶者在做着艰苦的探索,这构成
了劳动分工经济思想史中微弱的历史线索,直到最近才有望汇成
一股洪流。对劳动分工的研究大致上可分为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
由劳动分工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贸易理论,这条线索主要是沿
着斯密——杨格——俄林——卡尔多——舒尔茨等进行的。战后
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令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两个现象,“里昂惕夫
之谜”和产业内贸易,这直接推动了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
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保罗·R·克鲁格曼 1985 年出版的《市场
结构与对外贸易》,被萨缪尔森称之为这一研究的里程碑。罗伯特
·卢卡斯和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把人力资本的积累归结为劳
动分工的作用,构筑了他们的增长和发展模型。另一条线索主要是
由斯密——马克思——杨格——科斯——施蒂格勒等组成,以不
太明确的方式从劳动分工所内生的制度变迁角度展开的,这些经
济学家把制度安排看作是劳动分工的结果。然而,这两条线索都不
能单独形成一个劳动分工与制度演化的动态理论,所以在解释经
济现象时仍存在着局限性。杨小凯和黄有光在其《劳动分工与经济
组织——一个新的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中预言道,在劳动分工与
交易费用理论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微观经济学框架,20 多年后将能
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组成部分。^①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来说,
其理论先驱是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把正确
的制度结构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机制,劳动分工则是经济发展的源

① X. Yang and Y. -K. NG.,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 A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 Framework*, North-Holland, 1993. P. 470.

泉,这一思想至今仍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亚当·斯密在劳动分工问题上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失败,他只是提出了问题,未能取得辉煌的成就。^① 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这一精巧机制的分析虽然仍是一切经济学当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命题,然而他却未能告诉我们包括“看得见的手”^② 等制度安排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本书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斯密——马克思——杨格——科斯——施蒂格勒的思路,但又是在两条思路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的,否则就不能完成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与制度变迁的理论。例如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正是劳动分工这种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才使制度成为不可或缺的,然而制度经济学又未能把劳动分工明确作为制度分析的起点,这恐怕是该学派长期以来不能形成严密的系统分析框架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本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媒介,制度变迁为核心,累积因果的动态演化的不可逆过程,这就是我为什么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探讨制度变迁的原因了。这种探讨不仅能为制度经济学建立完整的理论解释框架作出初步尝试,而且也将成为发展经济学重建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本书的结构

分工和交换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制度安排的基础是人们因分工生产的产品要进行交易的相互需求。正是分工的演进导致了贸易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区域经济的形成以及产业结构的变革,

① G·J·施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23页。

② “看得见的手”是指管理、计划等协调机制,参看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